

CERI

长江教育研究院

Changjiang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教育智库
Thinktanks

2022年3月刊

总第45期

聚焦
两会

两会
专刊
(二)

两会 · 特别报道 两会 · 院长专访 两会 · 院长心声

目录 Contents

P01 卷首语

周洪宇：“当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P04 两会·特别报道

中国教育报 | 《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发布，2022 年教育工作这么干！

新京报 | 2022 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哪些教育新信号？专家解读 5 大亮点

科技日报 | 代表委员话“双减”：要跳出“双减”看“双减”

法治日报人大视窗 | IT 青年缘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帮凶 代表提出坚持源头治理完善网络诈骗法律法规

中国网 | 来自两会的视频邀请 | 读懂政府工作报告，就业不慌！

P21 两会·院长专访

新京报 | 周洪宇：建议缩短小学年限，推广九年一贯制教育

南方都市报 | 周洪宇：建议深入治理高端家政、众筹私教等变异学科培训



欢迎与我们互动

目录 Contents

新华网 | 周洪宇：如何让课后服务更“贴心”？更有吸引力？

界面新闻 | 周洪宇：代表不是当官，提建议应“因势而谋”

P46 两会·院长心声

新京报 |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新时代学制改革不应是简单压缩学制

中国青年报 | 周洪宇：普及 12 年义务教育，必须满足 4 个属性

央广网 |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家校社协同 实现育人最终目的

武汉教育电视台 | 周洪宇：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建议增设“副学士”学位

中国科学报 | 周洪宇：成立长江中游城市群高校联盟

中国煤炭报 | 周洪宇：氢能产业发展需下好全国一盘棋

中国应急管理 | 周洪宇：加快完善评估预警应急机制



欢迎与我们互动

“当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I 《代表》

来源 | 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周洪宇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长江教育研究院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

六十岁的周洪宇，2003年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至今已任四届，共提交议案、建议三百多件，平均每年二十件左右，其中七成被采纳。全国城乡中小学免除学杂费，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免费，建立全国安全校车工程，建立国家教师荣誉制度，将公立中小学教师纳入独立公务员体系……他的很多议案、建议已成中国的现实。

在很多人眼里，这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位富有经验、履职卓有成效的人大代表。2008年第一次任期结束，他就出版了两本书：《怎样做人大代表》和《怎样写人大议案》。这两本书，已成为很多新代表的“教科书”——有人说，这位研究教育史出身的学者，是在用他研究教育史的严谨治学态度，研究如何当好代表。



周洪宇代表 两会期间接受中国之声记者专访

1958年出生的周洪宇，十八岁下乡当知青，好在很快恢复高考，1978年，他考入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执教，2001年开始从政。他描述自己现在的生活，依然“除了看书，就是写书”，他称自己是“人大的岗位，代表的职责，学者的本色”。

激情，勇气，执着，理性，智慧——这是周洪宇回顾自己人大代表经历时最常提到的十个字。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题目就是，《人大代表的十字经》。

如何建言？“不要天天去揣摩谁的想法，你不是靠揣摩谁

的意图去履职。”

代表该为谁代言？“尽量寻找结合点，既有助于国家发展，又对地方有利。”

不喜欢风头代表：“满足于对媒体发声，满足于赢得一些名声、名气、影响力，会上却没有提出什么有分量的建议，这种代表我不喜欢。”

喜欢基层代表：“每一次听他们发言，你会感到震撼。”
如何看知识分子从政：真正的知识分子，“既要有批判性又要有建设性”，“不能仅仅认为只有批判性就是知识分子”，“这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一个曲解”。

任何时候一定要凭良知说话，要有自己的坚持，一定要有自己的理想，要做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就是周洪宇从政的一个标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所占有的位置、所具有的分量，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所有的盛世。”所以周洪宇认为，我们今天是遇到了一个大时代、一个好时代，这个时代给无数知识分子都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和机会，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去认识到这样一个时代给你的机会。



《政府工作报告》全文发布，2022 年教育工作这么干！

来源 | 中国教育报

新华社授权于 12 日全文播发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3 月 11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这个报告。

报告共分三个部分：

- 一、2021 年工作回顾；
- 二、2022 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
- 三、2022 年政府工作任务。

报告指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其中要求——

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

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加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在职培训与待遇保障。

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

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

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专门教育，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程度和质量。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

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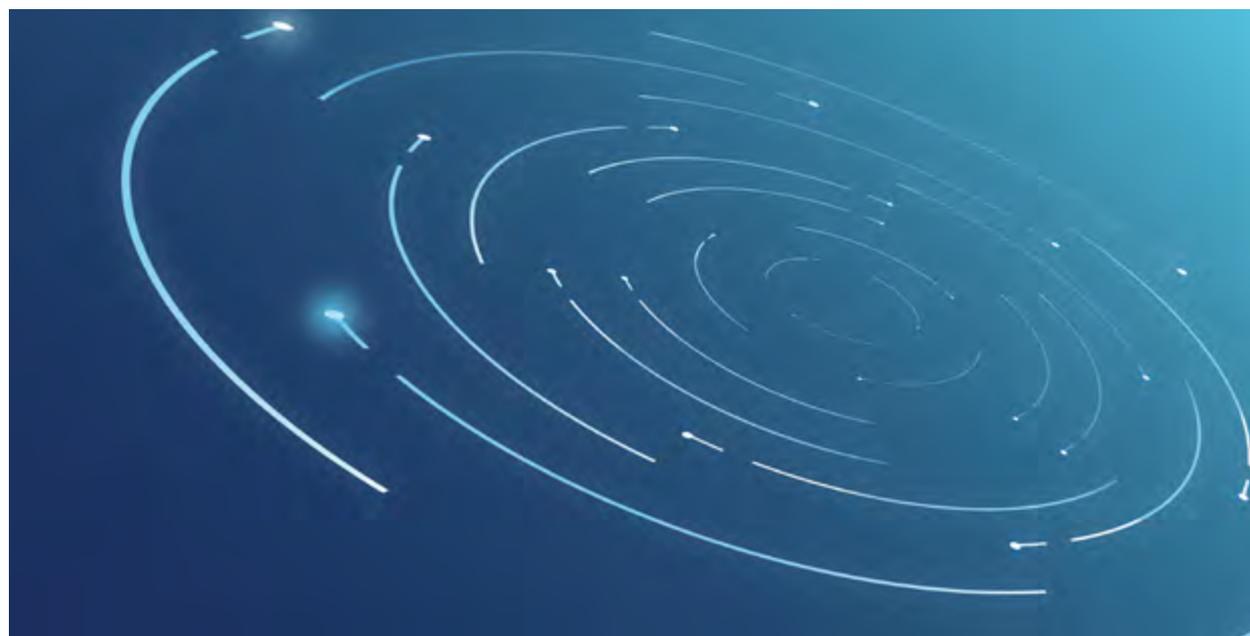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发展在线教育。

完善终身学习体系。

倡导全社会尊师重教。

我国有 2.9 亿在校学生，要坚持把教育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



2022 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哪些教育新信号？专家解读 5 大亮点

来源 | 新京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教育内容有哪些亮点？释放了哪些教育发展新信号？新京报记者邀请多位人大代表及专家进行解读。

2.9 亿在校学生，要坚持把教育这个关乎千家万户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大事办好。”3 月 5 日，2022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记者注意到，今年报告中涉及教育的内容与去年相比发生较大变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教育内容有哪些亮点？释放了哪些教育发展新信号？新京报记者邀请多位人大代表及专家进行解读。

专家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各地以常住人口规模来配置教育资源”对于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同时，“双减”工作也是重中之重，今年将保持措施不变、力度不变；报告还强调了普通高中的建设，问题导向更为明确，也是今年报告的一大亮点。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

公平与质量是教育工作两大重点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指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教育部分紧紧围绕一个主题，就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同时围绕着两大重点来开展工作，一个是促进教育公平，一个是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报告中这段话的内容，很明显体现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不但提出了问题，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做法，更为具体，更为明确，更为务实，更有温度。”周洪宇称。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表示，报告通篇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求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在教育方面，要求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围绕教育保障公平，要求在补齐三个短板上下功夫，即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和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张志勇

学习型社会建设在不断推进

“我国有 2.9 亿在校学生”，从这个数字当中可以读出哪些信息？对此，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曾天山指出，我国受教育人口在不断增加，大概占到了总人口的 1/5 左右，体现了国家学习型社会建设在不断推进，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曾天山看来，教育不仅是针对青少年，更是面向全民。教育和社会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缓冲就业压力，提高劳动者素质，让劳动力释放潜能，从这个角度看，教育起到经济“蓄水池”的作用。

同时，曾天山指出，我国受教育人口在结构上与原来相比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结构是金字塔型，大部分是受义务教育人口，高等教育占少数，而现在，我们义务教育已经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大幅增长。“结构上的变化体现了终身教育的要求，也体现了政府与时俱进，对教育的投入在不断增加。”

【亮点解读】

亮点 1：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突破性进展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对此，周洪宇认为，报告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对应地提出了解决措施。报告中特别提出“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适龄儿童就近入学。”这其中，“常住人口”是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周洪宇解释称，此前各地政府配置教育资源（学校、教师、设备等）是依据当地户籍人口规模。但大量的流动人口成为该地的常住人口后，还按照户籍人口规模来配置教育资源是不够的，难以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也能够就近入学，没办法做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周洪宇告诉记者，过往对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政府强调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原则，但实际上，如果不明确要求改变原有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两为主”很难做到。而这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各地以常住人口规模来配置教育资源，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亮点 2：双减仍是“重中之重”

“双减”是一个热门问题、社会焦点问题。报告中提到：“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在周洪宇看来，虽然只有一句话，但是有很重大的含义。

记者注意到，在报告回顾 2021 年工作部分也提到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周洪宇称，这就意味着，去年出台了政策，开始推进双减，今年就围绕推进双减，继续做好减负工作，这其中，工作内容不变、措施不变、力度不变，“这是一个重中之重。”

张志勇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双减”工作。“双减”工作是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大民生工程。做好“双减”工作，必须坚持校内外协同改革，做到减校外、强校内，减负担、提质量。

亮点 3：教师工资待遇要全面落实

周洪宇指出，过去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教师往往会提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相比而言，这一次报告中的相关表述也体现了明显的问题导向。“就是教师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待遇没有得到保障，所以要全面落实。”接着，报告将问题更为突出的乡村教师群体专门做了强调：“加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在职培训和待遇保障”，乡村教师从哪来？能不能留得住？如何让乡村教师成为“永久牌”，而不是“飞鸽牌”？周洪宇称，报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具体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着力解决教师队伍建设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张志勇表示，报告特别要求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加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在职培训与待遇保障，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这三个“药方”，非常具有针对性。

“但需要指出的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保障教师职业生活的幸福和尊严，要在提高工资待遇上下功夫，也要在加强人文关怀上出实招。”张志勇称，全面减轻教师负担，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要从减轻教师

非教学工作量、适当降低教师教学工作量、减轻教师工作压力三个方面入手。减轻教师的非教学工作量，必须尊重学校办学自主权，减少各种干扰，释放办学活力；适当降低教师教学工作量，必须强化教师资源配置，增加教师编制供给；减轻教师工作压力，必须构建良好教育生态，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克服各种教育功利化、短视化行为。

亮点 4：强调县域普通高中建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程、公共教育政策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县域普通高中优秀教师和学生出现流失，形成了以优质教育资源流失和教育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为表现的“县中发展困境”，有人将其比喻为县中“塌陷”。

针对这个问题，周洪宇指出，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审议之后增加了一句“加强县域高中建设”。而实际中，不少县先将重点加强县一中、县二中等重点中学的建设作为主要任务，但要做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也要办好。因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县域普通高中建设”，强调了普通高中的建设，更为明确，这是今年的一个政策亮点。

亮点 5：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职业教育强调了“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周洪宇认为，其实要办好职业教育所需的投入比办好普通教育还要大。而现实当中，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确实比较差，职业技术学校不具备条件、办学质量不高。“要让家长们对于职业教育有信心，首先要解决好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这是基础性问题。”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就业，一头连着产业，与经济社会联系最紧密，同时关系到能否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曾天山解释称，中职学校要强化基础地位，这些学校过去办学条件都比较弱，特别是土地面积等各方面都不

太够，要稳固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就要改善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同时，近年来，高职扩招超额完成，1486所高职院校承担了2019年以来高职连续扩招百万的任务，总共招了413万人，学校也在超负荷运转，所以办学条件也需要改善；此外，还在发展职教本科，目前已经有32所职业本科高校，承担着培养大国工匠的重任，也在不断探索和健全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加大投入，壮大职业教育的办学基础实力。



代表委员话“双减”：要跳出“双减”看“双减”

来源 | 科技日报

“‘双减’是以作业和课后服务这样的小切口，撬动教育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教育教学能力提升的系统变革。”全国人大代表、谢家湾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重庆谢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这次带来了学校五年级和七年级学生的课程表。课程表显示，孩子的体育时间充足，各类活动丰富。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刘希娅向科技日报记者阐释了她眼中的“双减”——“‘双减’并非只局限于作业和校外培训。它既是站在政治高度实施的一项政策，也是一次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机会，更是一场关于教育观念教育技术教育方法系统优化的攻坚战。”



“双减”之后，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刘希娅知道，一些家长的焦虑，其实是担心学生学习任务减轻后学校的教学质量。

重庆谢家湾学校在近二十年教育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减负提质、素质教育育人路径，还获得了中国质量奖。在这里，小学早上九点、初中八点半开始上课；保证孩子每天近2小时的户外体育活动；学校下午几乎是社团和专题

活动。“孩子们呈现出阳光自信、成绩优秀的群体特质。”刘希娅语带自豪。

以“双减”为契机，老师将作业、课后服务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深度相融；引导课堂尽可能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学校重塑作业观，作业全批全改、面批面改，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差异化布置作业。

“教研成为‘减负’和‘提质’间最重要的杠杆。”刘希娅说，老师们的研究，涵盖作息时间人文性、教室布局科学性和小学中学学习方式差异对比和衔接等多个环节，涉及每一个教学流程，每一个孩子。

刘希娅看到，“双减”之后，孩子们到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大自然的时间多了，学习负担轻了，心理也更加健康了。以前，家长觉得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都理所当然，“双减”之后，教育内卷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缓解，部分家长选择了理性。

治本仍要变革教育评价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在调研中也发现，仍有少数家长用“一对一”“众筹家教”等方式在补课，害怕孩子会落后于人。

家长用请家庭“私教”替代校外培训，“费用翻番，负担更重”。朱晓进建议，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来满足家长对高质量教学的多元需求，同时，将优质的校外培训资源引入校内进行服务。

多位受访者指出，推进“双减”政策，“治本”仍在于教育评价改革。

朱晓进说，要加快落实《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推进义务教育综合素质评价标准落地，同步深化高考中考改革，确保命题方向与“双减”精神相吻合，让考与学相匹配。

刘希娅也指出，要加大对各级政府落实教育评价改革、破五唯、“双减”等工作的专项巡视及督导力度；引导部分中学转变评价观念，由“数人数”“看指标生”到“看平均分”“关注每一个学生”。对违背党的教育方针的突出问题，可以由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她还希望，能优化中考机制，由教育部加强对各省市中考的统筹。

“双减”，践行新教育理念的契机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生活·实践教育”理念。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当前的教育面临三大脱节，即教育与生活脱节、学校与社会脱节、教学(学习)与实践脱节。“我们的教育，常常只注重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却忽视了生活实践能力的提高。”

“三个脱节”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周洪宇去过不少发达国家，考察他们的基础教育，发现他们都在努力解决脱节问题。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曾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三大原理，试图解决脱节问题。周洪宇提倡的“生活·实践”教育源于“生活教育”，让学科课程与生活课程，学校与社会、家庭、大自然等进行多方融合，完成对人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双减’成为一个绝佳契机，让全社会思考，我们的教育在减负担的同时还要增什么。”周洪宇认为，要增的，恰恰是能健全人的人格、能培养人生活实践能力的教育。简单来说，“我们的教育，要让学生既能动脑，也能动手”。

也有人有疑问，两者能够兼得吗？

周洪宇参与指导实验的深圳龙华区玉龙学校，实施“新生活教育”。学生上缝纫课、烹饪课和各种艺术、体育类综合实践课，学校里还有生活农场，供学生开展劳动实践。这所学校的学生，“考试成绩好，全面发展得也好”。

在传统教育观念中，家长对孩子的生活实践能力并不关心，只重视考试成绩。“这其实是一种短视和功利。”周洪宇强调，要跳出“双减”看“双减”。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就要站在中国教育、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去思考，未来我们教育的道路要怎么走。

IT 青年缘何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帮凶

来源 | 法治日报

一些大中专院校甚至名牌高校毕业的 IT 青年，却成为涉诈 App 的“制刀者”，由他们制作的“刀”，从成千上万的群众钱包中“收割”了上亿元。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注意到，在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涉诈案件中，不法分子利诱年轻技术人员，向他们订购涉诈 App，使他们沦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背后的“制刀者”。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年轻技术人员更是参与研发，成为黑灰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洪宇提交了《关于加大对利用 App 诈骗犯罪治理力度的建议》，建议通过源头治理、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管等多措并举的方式，加大对利用 App 诈骗犯罪的综合整治力度。

对于周洪宇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十分重视并作出回复，认为他的建议有助于改进相关工作，将认真研究，持续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严惩态势。

IT 青年沦为“制刀者”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高发多发，不法分子作案手段不断翻新，



黑灰产业链条盘根错节，成为民众反响强烈、深恶痛绝的“急难愁盼”问题之一。

全国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出重拳、下狠手，坚决守好民众“钱袋子”。2021年，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4.1万余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69万余名，打掉涉“两卡”（手机卡、银行卡）违法犯罪团伙3.9万个，追缴返还民众被骗资金12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年轻技术人员不仅充当了“制刀者”的角色，还会私下“接单”、参与关键环节，逐渐发展成从接单、开发，到封装、分发、售后等“一条龙”技术开发黑灰产业链。

公安部网安局2021年公布过这样一起案例：2020年12月，民警奔赴湖南等地成功抓获彭某等犯罪嫌疑人3名，扣押手机30余部，缴获违法App源代码10余套。该团伙成员均为国内顶级重点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技术实力处于行业第一梯队，实属高端人才。被这个团伙坑过的受害人遍布全国，涉案金额超1亿元。

办理多起相关案件的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任巍巍这样为“制刀者”画像：90后、IT男为主、大学以上学历，多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长期游走在法律边缘。

“毕业于名校的IT青年成为‘制刀者’，除了利益驱使，最主要的是法律观念淡薄，很多人会带着‘技术中立’的思维做这件事，或者并不知道自己写的代码最后会被拿去用于诈骗。有的没有意识到违法犯罪行为的严重性，有的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周洪宇说。

源头治理严把教育关

“集中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严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相关内容，不仅出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两高”工作报告中，也是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

多位代表建议，要严把“教育关”“上架关”“制度关”，从源头加强

网络诈骗治理。

周洪宇建议，要坚持“源头治理”的思维，以“精准滴灌”的方式，针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开展法治教育和思政教育，引导IT师生不做虚假App的技术助攻，发挥专业力量参与反诈，变诈骗“制刀者”为反诈“战斗员”。同时，网信部门应加强对App的监管力度，特别是确立对未在应用商城上架App的监管方式，堵住监管漏洞。还要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对涉案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从业禁止。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到，2021年，检察机关针对一些在校学生涉案，会同教育部发布典型案例，开展校园反诈，既防学生受害，也防受骗参与害人。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公安厅物证鉴定管理处（中心）副处长（副主任）陈林认为，在校学生可能是被害人，也可能是诈骗参与者，检察机关通过这一有力举措，向学生等易受骗群体揭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危害性以及防范提示，既能有效提高他们的防范意识，又能避免他们“误入歧途”，更好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司法保障。

建立 App 市场准入制度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回应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问题。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显示，根据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今年将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法律。

多位代表认为，加快制定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有利于更好预防、遏制和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在立法时要设立App市场准入制度以及开发、封装、分发等各类主体实名登记备案制度，制定行业规范、定期核查，从制度层面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通信网络环境。”周洪宇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原行长张智富建议，加快出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进一步加大对违法个人和单位的惩戒力度，为行业源头治理提供充分保障，建立跨部门监管协调工作机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本低、回报率高，而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对实施及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主体责任个人、团伙和组织应承担的法律职责阐述较为笼统，惩罚力度较弱，违法成本较低，对不法分子的震慑力不强，不利于电信诈骗的源头治理。建议加大惩戒力度，在法律层面提高处罚标准和犯罪成本。”张智富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原行长周振海认为，应当在立法时进一步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的全链条治理。

周振海建议，明确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业主管部门依照职责负责本行业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承担行业监管责任；明确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单位对物流信息、购物信息、贷款信息、医疗信息等可能被电信网络诈骗利用的重要信息实施重点监管和保护；明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众对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的鉴别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明确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监测系统，实现涉诈数据共享。



来自两会的视频邀请 | 读懂政府工作报告，就业不慌！

来源 | 中国网



就业是政府民生工作的根本，也是老百姓们关注的焦点。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076万人，创历史新高。

今年我国就业形势如何？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能读出哪些关于稳就业的信号？高校在校生对就业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对此，中国网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刘迪波。

谈及我国的就业形势，周洪宇表示，因为存在大学生就业、农民工就业、退役军人安置“三撞车”现象，我国的就业形势相较于别国显得更严峻、复杂。今年庞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也使得我国今年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的决心和力度都很大。”周洪宇说，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将“落实落细稳就业举措”“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纳入2022年政府工作任务。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就业的信号，周洪宇表示，今年，就业优先政策将得到进一步强化，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等阶段性稳就业政策将继续延续，对不裁员少裁员企业将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各项工作举措力度相当大。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就业、创业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对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保障，农民工就业，残疾人就业提出明确要求。”周洪宇认为，从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中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就业问题非常重视。

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自主创业，国家该给予怎样的政策倾斜呢？对此，周洪宇认为，大众创业是缓解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方式，对家庭条件较差的大学生，政府应根据情况予以创业补贴；还可以出台不同的政策，组织风投和各种投资基金，甚至设立创业基金作为种子基金来支持大学生创业。

面对今年的就业形势，高校毕业生该树立何种就业观？对此，周洪宇表示，部分大学生毕业后没有立即就业，有的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有的是主观上还希望再看一看，希望找到更好机会。针对大学生的这种“慢就业”观念，他认为，这是大学生的权利，但政府要起到积极引导作用。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大学生‘慢就业、缓就业’渠道也多了。但不管是考研、马上就业，还是自己创业，有一个稳定的状态是比较好的。”周洪宇认为，大学生要先找一个岗位干一干，在实践中锻炼自己，这样有助于整个社会、就业群体的稳定和局势的缓解。

高校在校生对就业的真实感受是什么？刘迪波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在校生，他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对大学生就业的关切与作出的努力。

“我相信自己能找到一份和专业相匹配并且满意的工作，因为政府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来保障每位大学生就业。特别是国家就业支持的决心和力度非常大，多级部门与领导都给予了很大支持。这让我们倍感温馨、踏实，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与就业充满了信心。”刘迪波说。

建议缩短小学年限，推广九年一贯制教育

来源 | 新京报



周洪宇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现行小学六年学制太长，已不完全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现实以及儿童自身发展的需要。

履职 20 年，周洪宇前后共提交议案、建议 418 件，近 7 成被采纳。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带来了 29 份议案建议。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和其他代表委员一起见证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取得进步和发展的一位参与者、推动者，与有荣焉。

长久以来，教育是周洪宇关注的重点领域。据他介绍，在履职期间提交的议案建议中，关于教育的话题占到了总数的一半。在今年提交的 29 份议

案建议里，记者也注意到，有些关于教育的议案建议他曾多次提及，有的是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第一次提到。

谈法律修订

设“副学士学位”，提高高职高专毕业生社会认可度

新京报：早在2008年，你就提出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建议，此后又在2019年、2021年提出要加快修订《教师法》，今年是你第四次提交这份建议。它的重要性在哪里，要解决什么问题？

周洪宇：现行的《教师法》是在1993年10月31日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2009年有过一次修订，但涉及的内容不多。《教师法》自颁布施行以来，对于提高教师的地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法》的许多规定已不能适应当前教育改革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的实际和要求，有的规定甚至严重滞后。

实际上，《教师法》的修订是纳入了“十三五”立法规划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中，按等级分为三类，按优先级来看，第一类是继续审议项目，第二类是初次审议项目，第三类是预备审议项目。《教师法》目前只处在第三类，所以我今年建议把它调整为初次审议项目。当然，如果具备了一定的修法基础，又达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从第三类调到第一类，也完全有可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在“十三五”立法规划中，它也只处在第三类，但社会各界要求加强家庭教育的呼声很高，所以这部法律落地就很快。

除此之外，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也相继出台了很多与教师相关的文件，比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其中就提到，要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我们从2007年以来就一直在全国两会上呼吁确定教师的

法律地位。按照国家意志培养人才，本身带有公务性，所以中国的教师，既是专业人员，也应该是公务人员。所以说，现在已经有了相关政策和文件精神，我们就应该把它变为法律，增加到《教师法》中，这样才更科学。

《教师法》的修订是一个很紧迫的任务，而且我们已经具备了修法的条件，所以今年我希望尽早完成《教师法》的修订。

新京报：除了关注教师法以外，我们也注意到，在履职期间，今年也是你第四次提到要修改《学位条例》。就《学位条例》而言，面对目前的新形势，有哪些地方还需要改进？

周洪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也比较早，是1981年1月1日实施的。我们国家是1977年恢复的高考，当时“77级”的学生是1978年3月份入学，我刚好那个时候上的大学。“78级”的学生是1978年9月份入学，前后相差半年左右，到1982年1月份我们这批“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最早一批大学生就要毕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尽快出台这部条例。

单从法名来看，当时制定的时候不是很严谨，严格来说，它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而不是条例。

从高等教育来看，我们有高职高专、本科、硕士、博士四个层次，但我们的学位只有三个层次。高职高专又几乎占整个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这是不够严谨和规范的。所以我也建议，要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关经验做法，构建与现有学位制度相衔接的高职高专院校学位制度，对高职高专院校设立“副学士学位”（或“协学士学位”）。建立副学士学位 - 学士学位 - 硕士学位 - 博士学位的高等教育学位制度。

我国高职院校学生知识和技能水平差异性很大，以单一的学历证书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对高职高专院校设立“副学士学位”（或“协学士学位”），有利于激发学生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技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有利于提高高职高专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营造全社会尊重技术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



2022年1月15日，江苏淮安，2022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虚拟现实（VR）设计与制作项目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33所高职院校的99名大学生现场比赛，旨在提升学生应用动手能力。

再比如，现行的《学位条例》中对于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管理者只强调职能的行使和权利的拥有，没有责任性的规定和义务性的约束；对学位申请者的权利和权利保障的途径缺少规定。2019年以来，翟天临“学术造假”风波不断发酵，北京电影学院等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这一系列事例表明，《学位条例》的修改完善工作迫在眉睫，学位的授予、管理、质量监督等工作亟待加强。此外，我认为，也要打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有了纵横贯通的“立交桥”，职业教育才能在国家教育体系中有地位，才能发挥重要支撑的作用，也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谈“双减”政策

探索新制度，教师按服务积分实行等同时间“调休”

新京报：“双减”是个热门话题，今年你也提了相关建议。“双减”政策落地后，如何构建一个良好的教育新生态？

周洪宇：“双减”政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教育生态的失衡，学校

教育主渠道不足，家庭教育严重缺位，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不够。促进“双减”政策落地，就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各安其位，学生、家长、教师各负其责，实现教育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实施“双减”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双减”文件中关于严禁随意资本化、由营利性转为非营利性的要求和对于收费价格的指导，正是去逐利化、去泡沫化的表现，目的是解除资本对教育的绑架，斩断剧场效应，降低百姓教育消费负担，使改革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群众。



2022年3月4日，陕西省西安市，大庆路小学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开展各类闯关游戏试题，代替期末书面考试。国家“双减”政策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

在“双减”共识初步达成，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机制正在形成，教育生态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校外学科类培训专业鉴定难，部分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加长，责任加重，压力加剧，隐形工作量加大，工作要求提高，师资配置和专业水平难以适应现实需要，教师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等。

这也说明，“双减”政策执行是一项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的系统工程，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针对“双减”政策落地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采取有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加大配套改革力度。

新京报：你刚刚也提到，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教师负担明显增加、校外培训乱象频发等困境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分析和解决？

周洪宇：关于“双减”，我今年一共提了5个建议。其中就有关于落实“双减”政策，持续深入开展隐形变异培训问题治理的建议。截至2021年12月底，我们的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压减了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了84.1%，校外培训机构资金监管比例显著提高，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比例达到100%。但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培训机构由“地上”转入“地下”，改头换面，以“高端家政”“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隐形变异问题，严重干扰了“双减”政策执行。

因此，我建议将隐形变异培训工作纳入社会综合治理范围。建议由政法、网信等部门牵头，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积极研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建立健全市场监管、网信、公安、体育、文旅等部门分工负责的联合执法机制，并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压实主体责任。对跨区域违规行为，由培训机构审批地、违规行为发生地相关部门共同查处。

我们也发现，2021年7月以来，为全面落实“双减”政策，各地纷纷出台课后服务、延时服务、作业管理等措施。随着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有部分学校反映，教师负担明显增加，工作时间明显延长。

所以我也提出来，要优化评价方式，强化激励效用，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让教师付出有所回报。也可以依据校情，试行“弹性上下班制”，探索建立“延时服务积分制度”，对参与延时服务的教师积分，以月或双月为单位，实行等同时间“调休”。如教师一周有4小时的“课后服务”，一个月有16小时，本月教师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可休息16小时。这16小时，既可累计使用，也可拆分使用。

在“校社”合力方面，可以尝试引入校外教育机构力量。很多培训机构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如艺术类、素质类的机构，完全可以加入校内的教学实践中来，发挥他们的优势，丰富校内“课后服务”的内容。上级部门应协调与统筹相关资源，如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引入一些有资质、有水平的机构供学校选用，同时还要进一步明确与规范相关收费标准，为学校聘请校外资源提供保障。也可邀请一些退休老师、家长及有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等志愿者参与进来，以此来减轻校内教师工作压力。

谈学制改革

改变“六三制”主导地位，让学制更加灵活多元

新京报：深化新时代“学制改革”这个概念是你在全国两会上第一次提出来。提出这份建议的背景是什么？

周洪宇：我最近几年从不同的角度谈过一些学制改革的想法，回应社会关切。比如，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是不是要马上纳入义务教育？我预计今年“学制改革”这个问题的关注度会很高，因为今年很特殊。

我国的学制改革始于1902年的壬寅学制，随后经1904年的癸卯学制、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直到1922年正式颁行壬戌学制。今年是壬戌学制颁行100周年。

1978年教育部正式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全日制中小学学制为十年，中学五年，小学五年。中学按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分段。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中小学学制，准备逐步改为十二年。”1981年4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从实际条件出发，逐步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将五年制中学过渡为六年制。

此后，全国各地大多重新回归到早前的“六三三”学制。由于六年制学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1985年以后，“九年一贯制”作为新的探索制度在一些学校实施。

学制的内容虽然历经数次修改，但是“六三三”分段法的主体架构却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严峻考验。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持续发展，当教育难以满足社会实际发展需求时，教育内部系统，包括学制也应该在新的形势下适时调整和改进，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新京报：具体而言，关于新时代的学制改革有哪些争议，我们探索的学制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周洪宇：国内也有人对“六三学制”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一是不符合现代少年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二是从修业年限来看，小学的年限太长，把五年能够完成的任务硬是拖到六年，既浪费国家的人、财、物，也延缓甚至阻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而初中只有三年，大量新学科在此阶段出现，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因此，他们主张实施“五四学制”。



2022年3月4日，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滨河小学老师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两会知识。

我认为，学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师资、课程、教材、校

舍、设备以及经费支撑等，需要社会形成共识，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学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过于冒进。

“五四学制”实行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教育，是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一种实验性学制。在以普通教育为主的情况下，农村初中适当增加职业技术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渗透到四年当中，也可以在最后一年进行，实行“3+1”模式。另外，我们还有个“五三学制”，它也是一种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三年的实验性学制。长期以来，这种学制在一些省市，尤其是许多农村广泛存在，但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行，明确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意味着这种学制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过渡性存在。

还有刚刚讲到的“九年一贯制”，它是将小学、初中教育作为一个整体，协调安排九年的教育内容。这种学制最初仅在极少数地区的学校施行，从实验结果来看，“九年一贯制”对不间断地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帮助学生克服小学与初中衔接时在心理、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不适应，合理调整九年之间的教学内容密度，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整体管理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现行小学六年学制确实太长，已不完全适应当代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现实以及儿童自身发展的需要。我建议，“缩短小学年限”，学制改革可将现行的“六三制”逐步改为“五四制”，并允许在局部试行“五三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如“十四五”期间，将全国极少数“五四制”实验学校争取扩大到占一半，改变目前“六三制”几乎完全占主导的现状，使学制更加灵活多元、富有弹性，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受教育群体的不同需要。

建议深入治理高端家政、众筹私教等变异 学科培训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周洪宇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双减”为2021年教育领域最热门的关键词，在本次全国“两会”上，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中的高频词。

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湖北省委会主委周洪宇，今年提出了五条与“双减”相关的建议，包括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开展隐形变异培训治理、制定《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条例》等。

作为已经履职20年的“资深”人大代表，周洪宇在履职期间，共提交议案、建议达418份，平均每年超过20份。在南都的专访中，他告诉记者，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高水平的、尽职的人大代表，要有人民的立场、建设的态度、

专业的精神，以及执着的勇气。“就算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也不能泄气。认为正确的建议，就要反复提。”他说。

谈“双减”政策

配套的教育评价制度还未建立

南都：“双减”是去年以来教育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您本次也建议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落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带来哪些变化，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周洪宇：“双减”政策从去年7月实施以来，取得了初步成效，比如严惩重罚了校外培训乱象，震慑效应初现；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补餐显著减少；学生3点半放学的难题得到缓解等。

但从过去大半年实施的情况看，由于多种原因，“双减”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首先，部分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急需科学治理、系统治理。

在学校教育方面，部分教师教育观念不先进，课堂教学模式陈旧、不能适应“双减”背景下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初衷；不少学校的作业设计理念落后、设计过程不透明、质量不高、反馈机制不健全，难以适应“双减”背景下减负提质的目标；中小学课后服务问题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在缺乏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内容不够丰富、城乡发展差距较大。

我们还要关注到，“双减”使得一些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加长、压力加剧、隐形工作量加大，同时，他们的工作要求加高，导致目前的师资配置和专业水平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因此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幼小有效衔接不够，普职比改革步伐缓慢，中、高考招生改革力度小，难以适应“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同时，多元化人才观尚未正式形成，“唯分数”的顽瘴痼疾还没有彻底消除，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力度不够，急需形成强大的合力。

南都：“双减”实施以来，部分家长的教育焦虑仍未缓解，原因在于孩

子中、高考的竞争压力依然存在。“双减”背景下，中国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是否更为迫切？中、高考改革有哪些方向？

周洪宇：“双减”政策才实施大半年，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政策还没有完全到位，这需要时间。

目前的教育评价方式，基本上还是以考试分数为主，尽管新高考强调要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但是这个理念真正落实在中、高考上，还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每次新的高考政策、方式出来之后，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改革也会出现反复、摇摆的状况，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但总的来讲，我认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轻易动摇。我们需要在坚持这个方向的前提下，继续推进，使过去“一考定终身”和“唯分数录取”的方式最终能得到根本改变。



在课后服务时间，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的学生参与探究社团课程，尝试自制制氧机。“双减”后的新学期，上海中小学继续有序推进课后服务。

谈校外培训行业治理

要加强隐形变异学科培训治理

南都：您今年提出，建议持续深入开展隐形变异培训治理，课外培训转入地下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治理？

周洪宇：培训出现隐形变异的现象，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有客观需要及市场需求，特别是在我们东亚儒家文化圈中，重视教育、重视校外培训辅导是一个传统。华人以及日韩学生即使到了欧美也依然如此，纽约唐人街等处满地的培训辅导机构就是明证。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一些培训机构改头换面，以“高端家政”“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的名义，继续违规培训，严重干扰了“双减”政策的执行。这些形式隐蔽性强，查起来不容易，要想真正得到遏制，还需要一个过程。

南都：校外培训隐形变异，是否也因为有些家长无法“割舍”学科培训班？

周洪宇：是的，现在部分“一对一”培训很难治理，也和家长有关。家长的心理其实很矛盾，一方面，家长存在从众和攀比的心理，担心孩子落后于人；另一方面，部分家长还存在卸责的心理，花点钱让孩子上补习班，这样小孩成绩不好，自己的心理负担也小一些，“反正我尽责了”。

家长的焦虑能够理解，但是家长也应该通过“双减”的契机，进一步认识到，孩子的教育要尊重科学，从实际出发，教育不光是学校的事，家长也负有很大责任。家长要去了解自己的孩子，不能只是督促孩子完成作业，更要注重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有些补习班的作用存在虚假夸大的成分，家长不能给孩子盲目报班，增加额外负担。

南都：您还建议加强对非学科类培训管理联防联控，如何实现？

周洪宇：非学科类培训行业现在存在多个问题。首先，审批登记不够严格，标准和门槛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大部分省份到现在还没有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分类设置的标准和审批流程。所以我建议，要先把行业标准和规范建立起来，完善审批登记的程序，把那些没有资质的机构清除出去，尽快结束鱼龙混杂的状况。

另外，要加强监管，尽快出台相关文件，分清教育、文旅、体育、科技

等部门的监管事权，之后推动各个部门协同管理，对机构的招生宣传、培训内容、财务收费、安全管理等实行常态化的日常监管。资金管理也要加强，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预收费，应全额纳入监管范围，而且培训机构要缴纳预收费的风险保证金。

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要加强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价格监管，遏制其营销急速升温，价格过快上涨。这样才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确保“双减”的政策能够见到实效。



在北京市健翔学校，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们做练习。

谈教师法修订

教师作为公职人员的身份要由法律明确

南都：今年您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修订《教师法》的议案，对于《教师法》的修订，有哪些具体建议？

周洪宇：《教师法》的修订我呼吁了很多年，总的来说，我认为，教师的法律地位要进一步明确，公立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应该由法律来明确。现在《教师法》的修订草案中，我此前提出的关于教师的入

职门槛、工资待遇、权益保障、专业培训等建议，已经有所体现。

今年，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 2022 年度立法进程的需要，及时将《教师法》修订草案由 2022 年立法计划中的“预备审议项目”，调整为“初次审议项目”，力争今年审议通过，让十三五立法规划不留遗憾。

谈人大代表履职

认为正确的建议，要反复提

南都：您履职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 年里提交了议案、建议共计 418 份，哪些得到了采纳？有哪些印象比较深？

周洪宇：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我在 2003、2004 和 2005 年连续三年建议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这个建议到 2005 年底就初步实现了。2004 年，我建议制定《国家统一法》，后来这部法律定名为《反分裂国家法》，第二年就迅速制定颁布。

在本届 5 年里，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价值 and 成效的，是 2017、2018、2019 年组织湖北团代表等连续几年向全国人大建议制定《长江保护法》，最终促成了《长江保护法》的出台。在这部法律的出台过程中，代表们之间也有不同意见，开始时有的认为应该叫《长江法》，既讲保护长江，又讲开发利用，但我认为，当务之急要更突出“保护”，这才有明确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效性。

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沈跃跃副委员长专门带环资委及国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到湖北调研办理这个重点议案，邀请了一批代表、专家一起参与讨论。最终《长江保护法》得以在 2021 年顺利出台实施，这是我这五年里比较满意的一个议案。

南都：这么多年，您积累了哪些履职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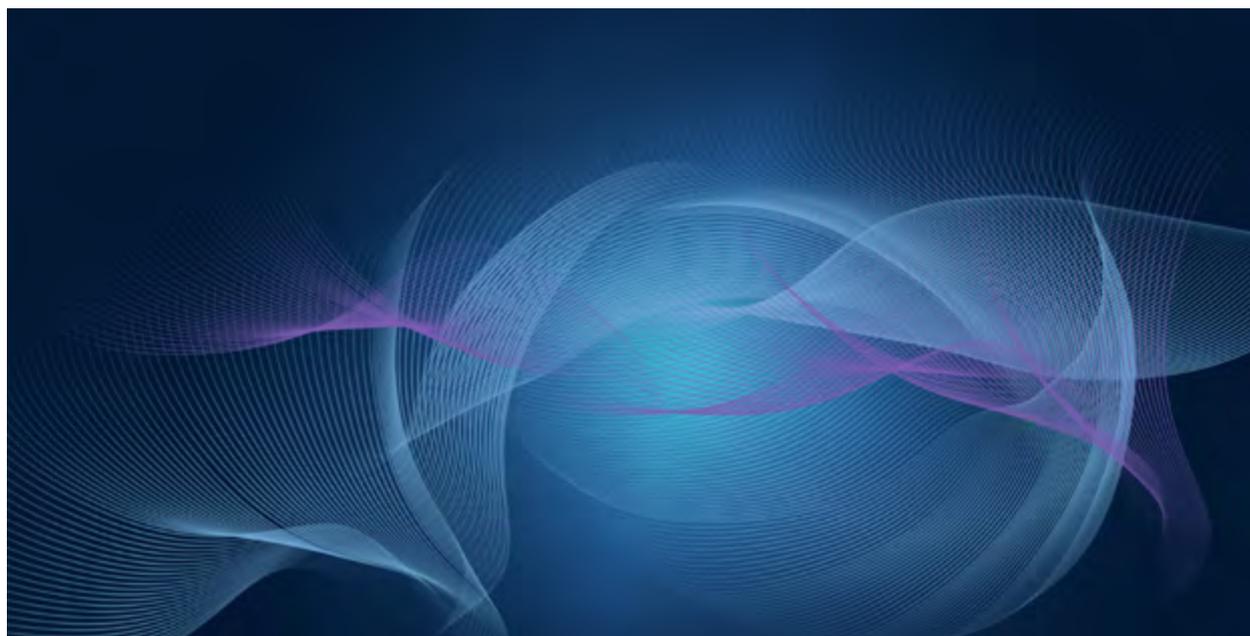
周洪宇：我们做人大代表都是兼职，因此要学会处理好本职工作和代表工作的关系。履职 20 年，我也在不断地反思与总结，我认为，做代表首先要清楚自己的立场，我们是人民选出来的，因此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反

映人民的呼声，传达真实的民意。

其次，提议案建议时，要有建设的态度，而不是简单的批评或轻易去否定。我曾长期在重点高校做研究，后来又有在政府行政和人大立法部门工作的经历，我深知有些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此，代表应该明确，我们建言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政府把事情办好，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名声与影响力。

另外，在提议案或建议时，要有专业的精神，带着问题去研究，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看法。平时要多到基层走走，多听取、多了解基层情况，有专业研究基础的人，还要让自己的议案建议有坚实的学理做支撑。不能仅仅提应怎样，还要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都说清楚为何要这样，以及在后续推进中如何去组织与实施，做好这件事。

除了这些，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高水平的、尽职的代表，还需要有激情、勇气、执着、理性与智慧。不能因为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就泄气了，如果你认定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那就要坚持，反复地提，要坚信，总有一天会成功。就算自己做代表的时候，没有成功，以后还会有别的代表继续提，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心胸。



如何让课后服务更“贴心”？更有吸引力？

来源 | 新华网客户端

教育是每个家庭关切的事，“双减”之后，如何让课后服务更有吸引力，成为不少网友关心的话题，两会之际，新华网特别节目《两会青年问答》连线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同时还邀请了一位青年网友快手达人“小一姐姐”参与提问互动，一起来讨论教育相关的热点话题。

以下是采访实录：

如何让课后服务更有吸引力？

主持人：如何让课后服务更“贴心”？更有吸引力？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周洪宇：课后服务在“双减”政策出台之后，有了更快的发展。这些课后服务主要是非学科类的，像文艺体育等方面的。从目前课后服务推出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社会上，这种非学科类的课后服务形式是多样的，内容是丰富的。

但是在推进过程中，也存在课后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所以我建议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可以积极探索与少年宫、博物馆、科技馆、周边专业场馆等的合作，让多种“课后服务”模式并存。很多培训机构有丰富的教学资源，艺术类、素质类内容完全可以纳入校内“课后服务”。

如何关切教师的关切？

主持人：合理减轻教师负担，怎样才算“合理”？又该怎么“减”？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周洪宇：“双减”政策强调，学校要“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就当下而言，建议切实关切教师的关切。比如依据校情，

试行“弹性上下班制”；建议校社合力，探索“延时服务”的多元模式等。

学校的核心工作是教书育人，要根据自身实际，努力做到不搞形式主义，不盲目攀比，关注教育本身。无意义的活动不开展，意义不大的少开展。帮教师做好“减”法，给教师营造一个不浮躁的、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样教师才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教学以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学生减负才能落到实处。

为何要重温陶行知的理念？

“小一姐姐”：对于学生家长的焦虑，你有什么建议？

周洪宇：从教育学、心理学等角度来看，我们的教育适当的增加一些文体类的内容，不仅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学校的学科课程，也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非学科类的学习内容增加之后，也会反过来促使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这是有科学依据的。我们在做生活实践教育的过程中，需要把陶行知的思想理念运用在今天的教育改革当中。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倡导即知即行，鼓励学生到社会中、生活中学习。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学科知识，也掌握了生活、文体知识，所以学生的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代表不是当官，提建议应“因势而谋”

来源 | 界面新闻



周洪宇 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20年418份议案和建议，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的履职答卷。

1982年，周洪宇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是国内研究陶行知的权威。2001年，周洪宇从学界跨入仕途，成为武汉市江岸区副区长，2003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年，他因提交义务教育免费建议轰动一时，该建议在两年后变成现实。

自从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这位教育专家每年平均都会提交20多份议案、建议，有“议案大王”之称。周洪宇的议案、建议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颇高，他反复提出出台家庭教育促进法建议、出台长江保护法等建议，已落地成为现实。

是什么让他保持源源不断的建议热情？20年履职生涯他的收获和遗憾

又是什么？适逢本届任期最后一年，周洪宇接受界面新闻专访，分享自己20年的履职感受。

“当代表不是当官”

界面新闻：作为一名履职达2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并且持续每年提出20多份议案、建议，你的动力来源是什么？

周洪宇：我们的代表工作都是兼职的，这跟西方的议员有本质的不同，但我们也要为选民服务，因为我们也是人民选出来的，要敢于为人民发声。我一开始就清楚，当代表不是当官，如果你想当官，当代表就没有意义了。我是做教育的，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渠道，深入中国教育的实际，了解中国教育的国情，再提出一点自己的建议，帮助推动教育往前发展。

要把这项事业、或者说使命完成好，就必须研究它，所以我说代表工作要研究化、研究工作要理论化、理论要实践化。我们要本着做代表的初心，要经常到基层老百姓中间去，要看到随着社会及形势的变化，老百姓的想法和愿望也在变化，我们代表要努力把他们的心声传递出来，这样做代表也才有新鲜感，才会有动力。

界面新闻：你每年提的议案、建议很多，有些甚至多年反复提，你提交议案和建议的标准是什么？

周洪宇：一方面，对于重大的、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要不断地提出，直到能够彻底的解决；同时，对一些带有长远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问题，也要努力把它提出来，可能在当下不能马上看得到成效，但是只要认定它有意义，那么也需要不断地提，保持有关部门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

界面新闻：今年两会你提交的议案、建议有多少份？

周洪宇：最终确定下来的是29份，我一直尽量保持在30份以内，跟往年差不多。虽然说建议数量没有限制，但太多难免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29份已经不少了。

界面新闻：你今年的议案、建议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教育的，尤其对“双减”政策格外关注，为此你做了哪些调研？

周洪宇：毕竟我长期在教育领域工作，所以议案建议还是以教育为重点。“双减”政策实施后，我带领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等教育智库，在东、中、西部6个省份，对130余所中小学的1万多名学生进行调查，我们发现，一方面，“双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另一方面，“双减”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困难。教培市场规模正在收缩，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进一步强化，所以教师需要在工作上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更多无形的职业成长压力。

对此，我提出要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并且为教师提供有效激励与保障。针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专门组织专家撰写了一份4万多字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落地构建良好教育新生态的建议》，此外还有好几份短一些的建议，从不同方面，打出一套关于“双减”建议的“组合拳”。

如何当好全国人大代表？

界面新闻：你目前担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学者到官员，再到立法机构工作，同时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你感受有何不同？

周洪宇：学者的追求是求真，但到了政府机构工作后你会发现许多事情都是错综复杂的，解决起来受制约的因素很多，并非轻而易举，你必须从务实的角度去推进，这是最大的不同。作为学者，你认定什么事有价值，就要去坚持，更多的是“单线思维”。我以前是纯粹的学者，再加上是做教育史研究的，与现实又是离得最远的。可到政府部门后，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就不得不考虑它的来龙去脉，它的成因和走向，从操作层面考虑的要好些，有些可能因为财力不够，有些可能因为舆论支持不够，暂时还没有办法推动。换句话说，政府官员更多要从务实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到政府部门工作之后，就要形成复杂的思维，“求真”和“务实”结合起来，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

点与突破点。

界面新闻：你每年都能提交议案、建议超过 20 份，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别的代表参考？

周洪宇：我从 2003 年开始做全国人大代表，当年就提了 19 份议案、建议，尤其是提出义务教育免费的建议，引起很大关注，并在两年后变成现实，给了我很大鼓舞。一般来说，刚当上代表的第一年，基本上很少发言，也不会提什么建议，更谈不上提出立法议案，主要是观摩老代表们如何履职，处于学习观摩阶段；第二年看出点门道，开始在小组会上讲一讲，提一两个建议；第三年有了更多经验，敢在全团大会上发言，写几份建议；第四年不仅敢大会小会发言、提建议并且会提议案，第五年就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但一届任期也就满了。所以，他们说，为什么没有在你身上看到这种缓慢变化，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能提那么多，而且“出手不凡”，能提出应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司法公职人员应入职宣誓、促进中部大崛起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建议。当时，作为中央分配给地方的代表名额，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代表培训工作的副秘书长何晔晖同志正好被安排在湖北代表团履职，参加活动，她留心观察了一段时间，找我谈话，让我给全国人大代表讲讲课，还建议我总结履职经验，撰写实践体会，现身说法，以更好发挥代表作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先生也鼓励我试试，我表示自己也是一个新代表，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最后推辞不过，只得勉强披挂上阵。

由于这个缘故，我就试着将自己第一个五年履职过程写成一本书，后来写着写着发现容量太大，就分成《怎样做人大代表》和《怎样写人大议案》两本书于 2008 年分别由人民大学出版社与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全国人大培训中心提供给代表培训使用。这些年经常有领导和代表建议，应该系统总结一下这 20 年个人的履职经验，重新撰写出书，给新代表参考，这就有了最近交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如何当好人大代表丛书》（包括《如何做好人大代表》《如何提出人大建议》《如何写好人大议案》）。

提建议顺应国家大趋势

界面新闻：当年你提出义务教育免费，为提出这项建议你做过哪些工作？

周洪宇：我是做教育史研究出身的，知道近现代我国一批教育界有识之士早就在呼吁义务教育免费，比如民国时期教育家陶行知、舒新城等人就在倡导推动此事。但那个年代条件不成熟，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普及义务教育，使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具备了条件。就我个人经历而言，2002年中央统战部组织我们到香港考察培训，当时香港理工大学刘佩琼教授给我们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授的政府基本公共职能理论，其中就包括提供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经费必须由政府承担，而不能由民众自己筹措。我又联想到2001年我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高访，也去了不少美国中小学实地考察，义务教育经费都是政府承担的。于是我就将这些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结合起来，向人大提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建议，主张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公共财政出钱全额承担。现在，政府公共财政理论已经成为一个常识，但那时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并不是太清楚。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需要先到基层调研，我在湖北孝感考察农村教育时，发现这里有的学校跟20多年前还是差不多，改革开放都这么久了，为什么有些地方的基础教育依然变化不太大？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

界面新闻：回顾这次建议，你认为它变成现实的关键是什么？

周洪宇：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建议的可操作性，实际上在此之前也有人提出过义务教育免费的建议，但都没有引起波澜，因为当时没能系统论证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所以我在提建议的过程中，从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责任人四个方面，都给出了具体操作步骤。考虑到实际情况，也提出“分类承担，分步实施”八个字作为工作推进原则。

界面新闻：这次建议对于你此后的代表工作有何启发？

周洪宇：这次建议给我的启发是，首先要做一个有心人，善于把各方面的知识、经验联系起来，我接受的教育和在美国、香港地区考察的收获，共

同构成了这次建议的理论基础；其次，要善于反思，总结自己建议的得失，在建议过程中不断学习、反思、完善自己的建议同样重要。凡是成功的建议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规律的，要去发现规律，运用规律。

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顺应国家大趋势，因势而谋、顺势而行、乘势而上。当时国家财力增长，对教育的投入也在增加，新一届政府也希望有所作为，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重要时期，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最终落地了。后来，我提出建立国家宪法宣誓制度、制定长江保护法等，也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界面新闻：作为教育专家，你也提出了不少非教育领域的建议，包括长江保护法在你多年的呼吁之下变成现实，你是如何跨领域研究并提出建议的？

周洪宇：我并不是学法律的，一开始是学历史，后来研究教育史、教育政策，然后去政府，再后来来到湖北省人大工作，分管教科文卫委员会，所以对这方面的法律知识就更熟悉一些，但本质上我并不是一个法学专家，也需要“借脑、借手”。实际上，西方的议员虽然是专职，但他们也并非对任何领域都熟悉，也有自己的助手和团队。我在2006年就组建了教育智库，代表工作、省人大工作和智库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才能提出具有一定价值，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20年履职经历是否有遗憾？

界面新闻：除了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平时你们跟政府各部门沟通吗？如何传达你们日常的声音？

周洪宇：当然有，而且我们的声音，只要具有可操作性，很快就会得到回应。我举个例子，去年12月，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正好碰到教育部怀进鹏部长，我向他提了两个建议。一是，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和长江教育研究院在每年两会前夕，都会邀请教育界代表委员和教育界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我希望教育部也能安排领导出席加强与教育界代表委员们的会前沟通，以促进工作。二是，教育部每年两会前夕都会给我们代表

委员寄送教育部年度工作要点、教育热点问答以及年度建议提案选题参考，以帮助人大代表议政建言，但是文件寄到我们手上大约是2月20号左右，距离两会开始还有十多天，我希望他们能提前一些时间寄出。怀部长非常重视这两个建议，重视与代表委员的会前沟通工作，当天回部里就做了安排。果然，今年过完春节2月9日我就收到了他们的文件。他们还安排司局领导出席我们举办的会前座谈会加强沟通，而且教育部自己也组织了一个规格空前、内容扎实的教育界代表委员座谈会，那天怀部长亲自带领全体在京部长及各司局一把手三十余人听取十余位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还邀请我出席。我感到这给各部委重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办理带了一个好头。

界面新闻：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建议除了书面答复，国家部委跟你们还会有进一步沟通吗？

周洪宇：不仅是书面答复，之前我连续几年提过有关南方供暖的建议，涉及到的部委就给我打电话沟通。后来我去北京，他们几个司长和副司长专门跟我见面，听取我的意见，并告诉我他们下一步工作安排。目前总体来看，很多重要的议案、建议，有关部门都是认真对待的，作出的书面答复也比以前更认真、负责，以前有些答复是几百个字，现在一般都是两三千字，有的还是四五千字长篇回应，从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解释。

界面新闻：回顾20年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经历，你有什么遗憾吗？

周洪宇：如果说遗憾，可能是一些建议暂时还没有变成现实。比如我很早就一直呼吁，建议确立教师的国家公务人员地位，将其作为特殊公务员或者说教育公务员对待。在日本、韩国等国家，教师都属于国家公务员。经过努力，这项建议往前走了一步，2018年中央发文，确立了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殊法律地位。但是，国家公职人员并不等于公务员，两者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经济地位还是有差距的。希望后来的代表们能继续努力推进。

新时代学制改革不应是简单压缩学制

来源 | 新京报

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开幕。针对近日引起公众关注的学制改革话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指出，学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社会形成共识，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过于冒进。

“教育领域改革持续向纵深推进，学制改革也应当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两会”，周洪宇也准备了一份《关于深化新时代学制改革的建议》，提出在部分地方试点“五四制”“九年一贯制”等灵活多样学制的主张。

学制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不能冒进

学校制度（简称“学制”）是教育制度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据悉，当前全国范围内绝大部分地区统一采取“六三学制”，以普通教育为主，小学六年、初中三年，是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主导学制；也有个别地区采取“五四学制”，即小学五年、初中四年。

对于“六三学制”，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小学年限太长，把五年能够完成的任务拖到六年完成，既浪费人、财、物，也延缓了学生的身心发展；而初中三年，大量新学科出现，导致学生学业负担过重。

“五四学制”是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一种实验性学制。其倡导者认为，小学生潜力较大，五年完全可以完成初等教育任务，为儿童的发展赢得宝贵的时间；初中学生原本课业负担过重，延长一年，可以减轻学业负担，同时可在完成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教育的同时，根据当地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使学生在思想、知识和劳动技能上做好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

“五三学制”则是一种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三年的实验性学制。周洪宇

指出，长期以来，这种学制在一些省市，尤其是许多农村广泛存在，但随着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发，明确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意味着这种学制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过渡性存在。2001年发布的《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国家将全面普及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实行“五三学制”的地区，2005年基本完成“六三学制”过渡。

此外，还有“九年一贯制”，将小学、初中教育作为一个整体，协调安排九年的教育内容。周洪宇告诉记者，从实验结果来看，“九年一贯制”对不间断地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帮助学生克服小学与初中衔接时在心理、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不适应、合理调整九年之间的教学内容密度、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整体管理等具有积极作用。

“中等职业教育制”则是主要在高中阶段培养中级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的职业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接收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毕业生，学制三年，是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重点。

当前，关于学制改革，有人主张，将现有基础教育阶段主体“六三三”12年的学制年限缩短至10年甚至9年。对此周洪宇认为，学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师资、课程、教材、校舍、设备以及经费支撑等，需要社会形成共识，需要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学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循序渐进，不能过于冒进。

周洪宇称，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学制也会随之调整以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但是无论怎样改革，都要立足中国国情教情实际，把握世界教育发展趋势，按照教育发展自身规律，深入实际调查，开展研究实验，进行试点改革，进而形成新时代学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与实施方案，而不是简单地一概而论。

不应简单压缩学制，建议合理分段、灵活多元

周洪宇认为，新时代学制改革可以将教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集中规划的基础上，向各地、各校提出硬性底线要求，以确保学制改革创新的方向不动摇，同时基于国家财政状况和各地经济发展

水平，为不同地区、学校发展提供更多弹性和广阔空间，以实现不同区域的多样化特色发展。

他建议，请全国人大委托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文旅部、人社部、卫健委等部门共同研究办理新时代学制改革事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明确遵循规律、有利育才、一主多元、换轨便利的基本原则，同时，强调集中领导、统一规划，避免各行其是、乱象丛生，引起社会震荡、影响改革发展。

周洪宇提出了关于新时代学制改革的主张，即在当前基础教育阶段普遍实施的“六三制”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部分地方试点施行“五四制”“九年一贯制”等灵活多样的学制分段形式。

具体来说，首先是“缩短小学年限”。周洪宇认为，现行小学六年学制确实有点长，已不完全适应当代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发展的现实以及儿童自身发展的需要。学制改革可将现行的“六三制”改为“五四制”，改变目前几乎完全是“六三制”占主导的局面，使学制更加灵活多元、富有弹性，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受教育群体的不同需要。

同时，周洪宇建议，加快“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更有利于培养人才，减少升学压力，减少时间浪费，提高培养效率，争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现有极少数“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逐步扩展到更大范围。

此外周洪宇建议，强化职业教育地位，高中职业教育应进一步加强与优化，不同地区尤其是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初中最后一年可适当增加职业教育内容。

“总的来说，新时代学制改革不应是简单压缩学制，而是对现有学制本身进行合理分段、健全完善，从单调、统一的‘六三制’逐步转变为‘六三制’与‘五四制’、‘小学初中分离制’与‘九年一贯制’并存，形成一个更为灵活多元、富有弹性与活力、更能满足新时代不同人群、不同实际需要的新时代学制体系。”周洪宇表示。

普及 12 年义务教育，必须满足 4 个属性

来源 | 中国青年报



如何走出内卷，构建真正有利于创新性人才成长的教育生态，是我国基础教育必须直面的难题。刚刚出台的“双减”新政拉开了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序幕，包括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一系列重磅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落地。部分专家学者建言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推行十年制或十二年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兼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认为，能否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问题，取决于多种因素，一是公益性、二是普及性、三是强制性、四是免费性，必须满足这 4 个属性，缺一不可。

从公益性看，中小学教育都具有公益性的属性。从普及性看，“我国高

中教育资源还很有限。”周洪宇说。

教育部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1.08万所，在校生1.56亿人，九年义务教育的巩固率为95.2%；而高中阶段，共有学校2.44万所，在校生4127.80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91.2%。“可见，还没有达到95%的普及性的要求，还有努力的空间。”周洪宇说。

从强制性看，周洪宇介绍，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属性，根据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违反相关规定，相关人员需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来规范，实施12年义务教育，或将导致普遍违法现象的产生。

从免费性看，目前，国家在巩固提高义务教育方面努力，新增教育经费多用于义务教育的巩固和提高上。如果在现阶段高中阶段教育免费，势必造成高中普及率高的城市居民子女可以享受免费，而高中普及率相对较低的农村子女，有相当一部分享受不到高中免费教育，从而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对普及高中教育非常重视，逐年增加投入为未来实行高中免费教育创造条件。“目前，我国实现了中职免费，但近期实行普通高中免费，国家财力难以承担。但普通高中的贫困学生免费是可以呼吁和争取的。一般来说，义务教育免费应是全国性行为，地方不能自行其是。当然，有财力的地方可以试行免费高中教育，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享受特殊照顾政策，实行免费高中教育。”周洪宇说。



家校社协同 实现育人最终目的

来源 | 央广网



2021年7月“双减”政策正式落地以来，基础教育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周洪宇在《做客央广网》栏目中强调，“双减”是一个基础性、潜力性的工作，家校社协同，才能实现育人的最终目的。

在教育部2022年的工作要点当中，继续把“双减”工作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新学期伊始，如何推动“双减”落实，学校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责任。“双减”后如何实现高质量、有效果的教学？对此，周洪宇表示，教师要转变理念，要把学生健全的人格能力提升作为重点工作、主要工作。在日常的课堂教学当中，除了知识的灌输外，还要注重学生生活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成长。

对于家庭层面，2022年1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事”，成为每个家长必须承担的责任，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周洪宇表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脱节的现象是不健康、不正常的，也是违反了教育规律的，尤其是违反了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他强调，“双减”政策落地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学生的培养中做到家校社协同育人，把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双减”育人的目的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建议增设“副学士”学位

来源 | 武汉教育电视台



长期关注教育领域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多条与教育相关的建议。包括出台非学科类分类管理规范；为高职高专学生增设学位等。

经过调查研究，周洪宇发现“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一些学科类培训机构改头换面，继续违规培训，严重干扰了“双减”政策的执行。一些地方存在非学科类培训日常监管不到位、部分机构资质不全、培训人员鱼龙混杂、预收费监管不完善。以及部分培训机构借“双减”之机肆意涨价、过度营销、制造社会焦虑等问题。

如何构建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周洪宇认为，这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也涉及文旅、科技等多部门的合作。为此，他建议相关行政部门全面、有效

承担起对培训机构进行监管的责任。

周洪宇建议：“文旅部、科技部，甚至包括国家体委、卫健委这些部门，出台涉及这些部门的培训机构进入门槛的相关文件，教科文卫体这些非学科类的条例、标准出来之后，管理才有基础。”

针对当下学位制度不够完善、没有对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差异化发展有明确规范等现状，周洪宇还提出了关于加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建议。

周洪宇说：“我们现在的学位只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但是我们还有大量的高职高专学生却没有一个学位，我认为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周洪宇认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已不能满足当下的人才培养格局，他建议为高职、高专学生设立“副学士学位”。

周洪宇介绍：“我们在湖北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做了个探索，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校内授予自己定名的叫‘工士学位’。我们在湖北多年探索的基础上，呼吁在高职高专这一块也要考虑设立学位。这个学位的名称叫什么呢？我们希望叫‘副学士学位’。美国、其他发达国家都有类似情况。这样就可以让学位发展到四级，这样一个改进可以调动所有在读大学生特别是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的热情，以及增加他在社会上的认可度。”



成立长江中游城市群高校联盟

来源 | 中国科学报

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科教资源丰富，现有普通本科高校 136 所（部委属高校 10 所），专科院校 170 所，人才资源富集。“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教育协同发展，对于将其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和国家教育现代化全局，为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探索可复制经验都有帮助。”在 2022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告诉《中国科学报》。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武汉、长株潭都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

周洪宇表示，统筹谋划、率先行动，既有助于整体提升区域教育服务支撑能力，从而将区域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地区创新优势、人才优势、发展优势；也有助于构建多层次、多样化教育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格局。

他建议，构建成熟高效的跨区域教育协调合作机制。由教育部牵头组织成立长江中游城市群教育合作组织机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教育厅为机构成员。通过联合组织召开研讨会、座谈会、现场会、专题会议，联合举办学术交流、发展论坛等形式，就长江中游城市群教育协同发展开展理论研究、政策酝酿和重大项目谋划，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教育协同发展落地见效。

建立部委属高校与省属重点建设高校对口支援机制。建议教育部协调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有关部委属高校与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省属重点建设高校，采取校对校、院包院的方式，定点支持帮扶，共建学科学院，加速提升地方省属重点建设高校学科建设水平和办学实力。

成立长江中游城市群高校联盟。建议教育部协调组织位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有关部委属高校与地方省属高校成立长江中游城市群高校联盟，鼓励联盟内开展联合办学、学术交流、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学生访学、

学科共建等多种形式的校际交流与合作，实现长江中游城市群高等教育联动发展。

设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教育协同发展相关项目。建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人社部、科技部等有关部委在国家级重大科研平台和基础实施布局、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共建共享、教育信息化平台互联互通、师资培训基地共建共享等方面设置一批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教育协同发展有关项目。



氢能产业发展需下好全国一盘棋

来源 | 国煤炭报

核心内容

地方政府发展氢能产业的热情高涨，各地纷纷出台支持政策，而国家顶层设计滞后于地方。国家专项规划和基础标准体系的缺失，导致氢能产业发展方向、目标和重点尚不明确，政策“碎片化”特征明显。

大多数省份都把氢能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和重点放在了燃料电池、汽车及其产业链的发展方面，核心技术研发领域备受冷落。

建议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统筹规划设计，明确制氢站、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审批政策及流程，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协调统一的市场机制。

“去年，氢能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并出现在30个省级‘十四五’规划和158个城市‘十四五’规划中。但国家顶层设计缺位、产业链发展不均衡不协调、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突破等问题，仍然制约了我国氢能产业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表示。

政策“碎片化”明显

无序竞争问题突出

今年，周洪宇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楚合作，提交了《关于推进氢能产业统一大市场协同发展的建议》。

“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调研时发现，这些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我国氢能产业的空间地理版图。但总体来看，当前氢能产业发展协同不足，特别是在市场、税收、布局、人才、金融、补贴等方面。”周洪宇说。

由于缺乏顶层设计，氢能产业协同发展面临较大阻力。“目前，地方政府发展氢能产业的热情高涨，各地纷纷出台支持政策，而国家顶层设计滞后

于地方。国家专项规划和基础标准体系的缺失，导致氢能产业发展方向、目标和重点尚不明确，政策‘碎片化’特征明显。”周洪宇指出。

我国尚未明确氢能生产、储运和应用等环节的归口管理部门，相关管理章程、法规体系需要完善。由于氢能发展涉及面广、产业链长，当前不明确的管理体系严重阻碍了跨地区、跨部门、跨产业协同发展。

比如，我国东西部能源分布不均导致上游氢能资源与下游氢能应用市场的空间分布不匹配，需要大规模、长距离运输来实现“西氢东输”，但相关制度欠缺与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限制了氢能储运。

除此之外，各地在推进氢能产业发展时也面临着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风险。氢能市场一体化推进缓慢，难以发挥出氢能产业链各环节的比较优势，市场分割阻碍了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产业链各环节互联互通，各类氢能项目和“全链氢能小镇”等涌入市场，暴露出盲目上马和同质化建设的问题。

“山东半岛在制氢能力和政策环境上有明显优势，京津冀在下游产业发展和可持续性上动力较强，氢能产业不同环节发展优势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各地竞相构建全产业链条将导致氢能产业的重复建设。”周洪宇说。

《2020年氢能应用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我国氢能产业链相关企业已达2196家。其中，涉及燃料电池、电堆以及关键部件等中下游产业的企业及项目占比超过70%，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同质化严重，缺少全球领先的、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除了宁夏以外的大多数省份都把氢能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和重点放在了燃料电池、汽车及其产业链的发展方面，核心技术研发领域备受冷落。”周洪宇表示，“技术路线各异、专业人才稀缺、技术研发不协同，这些将带来无效竞争和资源浪费。”

加强氢能产业顶层设计

建立统一协调市场机制

如何推动氢能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在周洪宇看来，当务之急是加强顶

层设计，制定氢能产业发展路线和规划。对此，他建议按照全国一盘棋的原则统筹规划设计。

周洪宇指出，在氢能产业发展初期，应立足我国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完善政策体系，明确牵头部门，明晰产业链各环节的归口管理部门、制度，明确制氢站、加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审批政策及流程，理顺管理体制。

“氢能产业发展亟须建立协调统一的市场机制，规范氢能产业基础标准。强化多能互补，比如，氢能作为能量储存介质参与电力市场。”周洪宇说。此外，周洪宇建议加强设备技术、检测和安全标准建设。

在周洪宇看来，推动形成区域间氢能产业供需衔接、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需要推进氢能全产业链建设。各地应结合产业基础确定发展战略，特别是要注意下游产业应用场景，减少同质化竞争。

“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川渝鄂氢能产业集聚区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要探索行业协调、多能融合的发展路径，比如推进煤化工和可再生能源制氢融合示范等。”周洪宇说。

针对一些“卡脖子”技术难题，周洪宇建议在国内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在国际上，加强全世界范围的氢能合作，建立国际合作和创新平台。特别是在氢能产业发展初期，可以引进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技术，在此基础上开展自主研发。

“氢能产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特别是财税、金融政策。政府应建立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氢能稳定供应。在深化能源市场化改革时，进一步健全碳定价机制，提升氢能成本优势。”周洪宇说。

加快完善评估预警应急机制

来源 | 中国应急管理



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防控应对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重构疫情报告传输制度，疫情报告传输实施“一点四级”创新机制

“目前我国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规范主要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从现有规范内容来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的有关规定还存在一定漏洞，不利于具体适用。因此，我们要以现有的法律规定为出发点，对复杂的信息发布程序进行梳理和分析，找出其中的不足和遗漏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大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兼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快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法》的议案。

科学评估突发事件应对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是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础。我国在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主要领域的突发事件仍然易发多发。这个基本判断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和完善应急管理体系的基本前提。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预防、控制、化解、消除公共卫生事件危害的重要职责。公共卫生安全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是一项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都很强的改革任务，既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救援体系，又要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治救援、事后恢复、物资保障等各个环节进行统筹设计，既要强化体系建设，又要着力从制度机制层面理顺关系、强化管理。”周洪宇表示。

周洪宇提出，确立更加科学完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律，是应急管理机关高效推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的前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作为国家机关一项重要的公共治理职责，必须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与处置将长期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体系嵌入法治框架内，用法治的方式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机制和手段。”周洪宇表示，重大疫情评估预警应急机制是整个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前端。

“立法目的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防控应对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周洪宇说，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央地联动应急机制不是从预警或启动响应程序后才开始，而是从疫情报告发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对此，周洪宇建议，重构疫情报告传输制度，疫情报告传输实施“一点

四级”创新机制，即疫情报告传输从首发病例基层医院一个点开始启动发出，同时向四个级别政府卫健委和疾控中心同时发出，且以网络直报和人工直报两种形式同时报出，四个级别即指县级、地市级、省级、国家政府卫健委和疾控中心；与疫情报告传输制度匹配，随即产生疫情监测、分析、评估及预警决策机制；明确专家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给予专家必要的权力，明确专家在疫情评估预警决策中的地位；确立预警决策法定时限制度，确保及时启动预警；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权与应急预警启动权下放至县级政府。



长江教育研究院是在湖北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由华中师范大学和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发起，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的教育研究机构。

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在中国智库索引评选中社会智库类MRPA测评综合排名全国第三，MRPA资源效能测评全国第一。2017年入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2017年度中国核心智库”。2018年在中国智库索引社会智库类PAI值评分榜全国第二。2019年，荣获中国教育智库联盟“最具影响力智库”称号。我院研究成果《<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中西部6省12县(区)120余所乡村学校调研报告>系列成果》《关于贫困地区贫困生的家庭背景、教育期望教育需求情况的调查与建议》及《疫情对我国教育的综合影响及应对策略系列成果》分别荣获由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共同评选出的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CTTI来源智库精品成果奖。

目前，长江教育研究院正在按照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与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构与高校的战略合作，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力争把自身打造成国内外一流的智库。



联系电话：027-87671389

官方邮箱：cjjy2006@cjjy.com.cn

官网地址：<http://cjjy.com.cn/>

公司地址：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省出版文化城B座6楼